

近代无锡人的教育书籍

| 汤可可 文 |

◆ 千帆竞发 ◆

中国近代教育面临的基本任务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,这包括知识体系的重构,也包括知识传授方式的变革。教科书及其他教育类图书,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这一转型的进程。近代无锡人教育书籍编纂出版,所反映的正是这一变革的转折起始和初步推进,从中也可窥见那一代教育人的志向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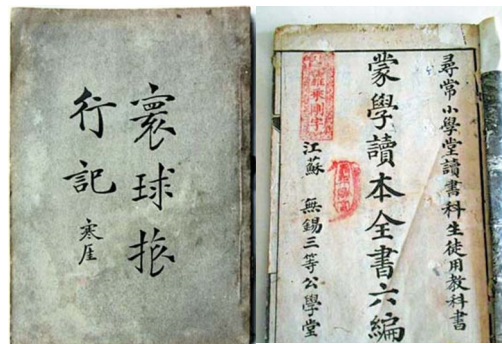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立足本土。现代教育的知识体系不同于传统的经史子集,教育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修身格物,怎样才能在学习、引进、借鉴西方教育体系中改造传统,走向现代化呢?近代无锡人的教育图书编纂,经历了一个从引进为主到参考借鉴再到自成体系的过程。徐寿、华蘅芳等人早期翻译笔述英德科技原著,稍后华文祺、杨寿桐等人从日本转译教科书,再后来是各科书籍的自主编纂,特别是顾复的农学,王庸的地理学,丁福保的医学卫生,杨荫浏的音乐等,都在知识体系结构和教材教法等方面,对本土化作了可贵探索。

——务俾实用。无锡人的教科书编纂,从普通学校的基础学科向职业技术教育和社会教育领域延伸,在诸多实务操作的学科中作出开拓性的努力。李钟瑞从事蚕桑改良,编撰《实用养蚕学》《实地养蚕法》等,对于改良蚕种、辅导育蚕具有很强的实用指导性。张炯曾任江苏省女蚕校制丝科主任,后应薛寿萱之聘担任两家丝厂的厂长,是无锡历史上第一位女厂长,著有《制丝学》《丝厂管车须知》等,都以切合实际著称。而薛明剑、陆静山、顾毓珍等有关工场设计管理、实用制造工艺、工业设备原理的编纂,无不贯穿付诸实用的指导思想。

——力求出新。近代无锡人的教育图书编纂,相当一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,一些书的出版,常常标志着一个新的学科的形成。秦瑞玠关于商法、商标、著作权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,所著《著作权律释义》《公司条例释义》等,在国内均为首屈一指,他本人也被任命为中国商标局首任局长。不仅是开创新的学科门类,就是在著作内容上,无锡人也多有创见发覆。如贺康的《柞蚕学概论》除综述柞蚕生物学构造、制种育蚕产丝、病虫害防治外,还论述技术改良、蚕业生产合作、蚕场设施管理等,对于战后蚕丝业的恢复、调整、改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——追逐时代潮流。中国近代内忧外患,因之而起的改良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。无锡人教育著作的编纂,往往紧随时代进步的潮流,不仅跟上几次学制改革的步子,而且呼应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变革的鼓角。20世纪前半期,科学和民主是思想界、学术界的主流呼声。杨荫杭、章渊若、邹文海等人的论著,分别就公民教育、法律教育、法治宪政等,从学理上作出阐述,倡导社会变革。最突出的是抗日救国。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几乎第二天,无锡县初中即发出《抗日救国运动专号》,省立教育学院也及时刊印《民众抗日救国读本》。自此直至抗战胜利,无锡教育人持续不断推出防空、救护、通讯、战时经济、救亡宣传等教材、阅读材料。即使如钱基博这样固守传统的学者,也在编写文学、历史教材、教参时,加入了历史上民族英雄、抗敌故事、军事谋略、外交策略等内容,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凝聚力量。

在中华民族驶向现代化彼岸的伟大航程中,无锡教育界人士用自己的纸笔图文,张开了一领迎风飞扬的帆船!



◆ 果实留香 ◆

钱江等人主编的《百人千书——无锡近代教育著作书目初编》(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,2016年),初步展现了近代无锡编纂出版教育类图书的面貌。该书收录的近代无锡人所编教育著作,以见到原书或电子版图书为依据,而百年前无锡人实际编纂出版的图书,要比现在能见到的多得多。

清末时期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孕育和初生期,也是新式教科书编印的起步阶段。这一时期无锡人编印的教育书籍为数不少,合计285种,占书目所列图书总数的14.1%。面对新式学堂起步发展,无锡教育人敏锐地看准时机,主动投入教科书编纂,所出各类教育图书中以教材为多。这一时期编印的教材有186种,占期间印行教育书籍总数的65.3%。而其中相当一些为中国新式学堂教材的开山之作,例如杨模辑录的《谟实学堂课文》,吴稚晖等人编辑的三等公学堂《蒙学读本全书》7编7册等,均具有全国领先的意义。

清朝覆亡,民国肇始,国内工商经济和教育文化都出现若干新的气象。无锡人教育著作编纂,在改出修订版的同时也推出了部分新编教材,新编本突出“共和国”“新国民”,如赵传璧、秦同培《共和国教科书新手工》。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,面向学生的课外知识读物数量激增,期间所出读物198种,超过同期教材总数的173种,占这一时期书目收录总数的33.7%。特别是孙毓修所编“童话”“少年丛书”等系列丛书,以编译国外童话作品和改编中国历史故事相并举,受到少年儿童喜爱,很多书一版再版。

1928—1937的10年,是无锡人编纂教育书籍最为兴旺的时期,近代已知2000多种图书中,40%成书于这10年间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,教育部加强了教科书的统一编纂和集中审定,学校和民间书局自编自印教科书受到限制。这期间无锡人的教材编纂出版161种,数量有所减少,但逐步走向规范化、标准化。相对应的是,教学参考书、课外知识读物的编纂数量继续增加。其中教参134种,知识读物300种,分别比之前16年增加1.0倍和51.5%。

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,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也进入一个寒冬期。8年间无锡人编纂的教育图书共160种,不到战前10年间编纂数量的20%。其中在大后方出的相当一些书籍是为抗战而编著,例如高行健的《特种教育防空篇》,陶葆楷的《军事卫生工程》等,具有鲜明的战时色彩。这一时期选编的国文、史地、音乐、体育教材,也体现了弘扬爱国精神、坚定抗敌信心、服务抗日战争的主旨。值得一说的是,薛暮桥著《经济学》《政治经济学》等,作为教材在抗日根据地和桂林、重庆等地多次翻印,广泛应用,标志着共产党人编印教科书影响的扩大。

战后短短3年多时间里,无锡人共编纂出版教育著作166种,其中教材45种,知识读物47种,分别占总数的27.1%和28.3%。战后百废待兴,小学、中学基础教育用书,采用教育部征选,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等应选,联合编纂发行的方法,无锡有钱穆、顾毓琇等多人参与编写、校订、审定。而初高中、大学新标准会考、入学的指导用书,也统一组织编印,无锡人吴沧、浦漪人等承担了编辑、校订任务。在解放区,秦邦宪译校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薛暮桥的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》,孙治方的《简明哲学辞典》,陆定一的《论世界形势》等,也在红色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◆ 应时花开 ◆

前一个世纪之交,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千年大变局之中,一方面,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的激烈冲撞,使得中华帝国从栋梁到地基都出现了深深的裂缝;另一方面,新的见解、新的思想开始在知识人群中传播,经济、社会中新的因素开始萌生,其中尤以新兴工商业和新式教育展现出生长的活力。

无锡邻近当时中国最大的开放商埠——上海,19世纪后期两地之间相当密切的人员往还,使一些无锡人较早感受到东渐的欧风美雨,接触到不同于传统经史子集的新的知识体系。眼看封建皇朝的衰败,无锡一些青年学子,包括早年考中秀才、举人的读书人,转而挣脱传统科举的束缚,进入新式学堂求学。早在1897年,就有杨模等人发起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——谟实学堂,比清廷下诏废科举、兴学堂早了整整8个年头。至1902年,东林、经正、胡氏等学堂相继在无锡城乡开设。短短几年间,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并且规模齐整、学科完备、成绩斐然可观。而新式学堂的开办急切需要各科教科书提供应用,这对教育书籍的编纂出版提出巨大需求。

与各个层次的办学展开相伴随,近代无锡涌现出了一批有魄力的办学者和有能力的教书人。除工商实业家外,早年就学于国内中高等学校和留学海外的一批先行者,纷纷回到家乡兴办学堂,执教和从事教育管理,如胡雨人、侯鸿鉴、陶达三、顾倬等,其中不少人成为杰出的教育家。他们与先后到无锡担任教职的外地优秀人才唐文治、俞庆棠等一起,构成无锡近代学校实力强劲的骨干师资队伍。出于无锡人之手的教育著作,凝聚了他们的智慧和经验。

毫无疑问,无锡人编纂出版教育图书,还得到各类图书出版、印刷机构的支持和帮助。近代无锡人对机器印刷、照相制版的敏感和率先接触,使他们在近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创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1902年廉泉、俞复等人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,1906年吴稚晖在巴黎设立中华印书局,回国后也加入文明书局;1908年丁福保创办医学书局;文明书局并入中华书局后,华文祺、华汝成等一批无锡人成为其骨干;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、上海图书公司、北新书局、开明书局等知名出版印书机构,均有无锡人的参与和贡献。而无锡当地涌现的一批书局、印刷公司,如锡成、五大、协成、大同等,也各成规模和特色,为教育书刊的出版、印刷提供各方面的服务。

近代无锡教育的进步领先于其他地区,已逐步为人们所认知。这不仅在于学校数量较多,教育普及程度较高,而且表现为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,以及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较为显著的人才产出。在无锡,还有一点令人赞叹,那就是近代无锡人编纂出版各类教科书、教学参考书等,蔚为大观,在同类城市中罕有其匹。